

柯伦泰夫人小说的译介与中国“红色罗曼蒂克”的创作

方维保

〔摘要〕 俄苏时代的女性革命家柯伦泰夫人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汉译,在“后五四”时代的中国掀起了巨大的翻译和阅读潮流。其理论和创作中所提倡的“新道德”,将肇始于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柯伦泰夫人在理论和小说创作中所构建的“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引发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红色罗曼蒂克”创作。但是,中国现代左翼罗曼蒂克创作,并不是对柯伦泰夫人的简单复制,其在构思故事、表达价值立场的过程中,受到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和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既有模仿也有变异和创新,其审美内涵也较之于柯伦泰夫人的表达,更加的丰富复杂,也更加的色彩斑斓。

〔关键词〕 柯伦泰夫人;译介;红色罗曼蒂克;变异

—

俄苏时代文学对“五四”落潮和红色革命时代的中国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作为俄国“十月革命”元老之一的女性革命家和小说家柯伦泰夫人(1872—1952)的影响尤为别致和深刻。

柯伦泰夫人在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将女性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相结合,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妇女权利的著作和演说,如《新妇女论》(1918)、《女工为权利而斗争》(1921)、《性关系与阶级斗争》(1921)、《婚姻关系领域内的共产主义道德》(1921)、《一个性解放的共产主义妇女的自传》(1926)等。她激烈反对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认为它将女性如同妓女一样变成了男人的性工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性欲的满足就像喝水那样平常。她总结自己一生的革命活动说:“我的行动和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劳动妇女的完全解放,和创造一个全新的性道德。”^①

柯伦泰夫人还写作了相当数量的小说。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工蜂之爱》(1923)包括《瓦西里萨·马雷金娜》《三代人的爱》《姐妹》等三篇小说;她在1927年又出版了小说单行本《伟大的爱》《瓦

方维保,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芜湖241003)。

①A. Kollontai,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exually Emancipated Communist Woman*, trans. by Salvator Attansio,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p.33.

西里萨·马雷金娜》和《姐妹》。《瓦西里萨·马雷金娜》在翻译成英文时,作者将主人公名字的标题换为“Red Love”,——《赤恋》。文学史习惯将她的《三代人的爱》《姊妹》《赤恋》合称为《爱情三部曲》^①。

柯伦泰夫人的小说,大多以俄苏革命为背景,以女性视角讲述革命同志之间的爱情、婚姻与性爱。小说《姊妹》讲述一个女性革命者,当她发现身为布尔什维克官员的丈夫召妓以后,非常愤怒,但是她却将这个妓女视作同受奴役的“姊妹”,即使怀孕了,也毅然离开了丈夫投入革命生活中。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激烈抨击了父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奴役,并主张所有的女性都是反抗父权制的“姐妹”。小说《赤恋》讲述了女革命家瓦西里萨·马雷金娜,为了革命工作,而与身为布尔什维克高官的丈夫弗拉基米尔分居两地。当她去探望的丈夫时,发现他已经堕落为一个贪污腐化分子,背叛了他们的婚姻,也辜负了她在政治上对他的帮助和引导。她虽然已经怀孕,但还是毅然决然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她正从事的“社区住宅”建设事业上来。柯伦泰夫人的小说所演绎的全部都是革命中的爱情(性爱)故事。这些小说一般都存在着女性革命者遭遇同为革命同志的丈夫(或同居男友)的背叛,怀孕后毅然离家出走,投入革命工作,然后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革命同志恋爱的情节。

柯伦泰夫人最为集中地表现她的女性道德主张的是小说《三代人的爱》。该小说讲述了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女性革命活动家的恋爱生活。祖母玛丽娅·斯捷潘诺夫娜,离开家庭和丈夫投身于社会活动,但在性道德上她却非常的传统,即使丈夫背叛了自己,她却依然为他恪守贞洁。母亲奥尔迦在革命的活动中与“丈夫同志”康斯坦丁同居,在躲避追捕的过程中,与技师M发生了热烈的爱情。她同时爱着两个男人,任由感情驱使,在两个男人之间辗转同居。她认为,自己“有着多样和复杂的情感需求”。祖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性伴侣,而母亲却有着几个,但母亲的性爱自始至终有着感情的成分。第三代孙女热妮娅,不但与母亲的同居男友廖勃柯夫发生了性关系,而且与其他的革命同志也有着同样的关系。当她怀孕了以后,她甚至不知道孩子是继父的还是其他革命同志的。

在《三代人的爱》中,柯伦泰夫人以主人公热妮娅的倾诉,为她自由的性爱辩护。她认为,性与爱是分离的。人不能没有性,就像渴了不能不喝一杯水一样(“一杯水主义”)。她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尊崇了身体的需要,“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有了性并不等于有了爱,“我与安德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从母亲那儿带走什么”。自己与同志发生性爱,但那不是恋爱。恋爱是存在的,但“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已经用在了革命工作中”,哪有时间恋爱。^②柯伦泰夫人通过热妮娅之口,表达了革命与恋爱的冲突。热妮娅所追求的新道德,其实是革命者的权宜之计。而假如放在社会环境中来考察,柯伦泰夫人实际上表现了性爱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她所做出的选择,那就是充分照顾人的生理需求,人性本能。相对而言,其祖母恪守于家庭伦理,压抑自己的性爱冲动,才是不道德的;相对而言,其母亲以恋爱为名,行性爱之实,才是不道德的。她因此将热妮娅式的性爱命名为“新道德”。

这部小说通过三代人的恋爱,展示了革命者性爱观念的演变,同时也通过叙述主人公“我”表现了这种性道德的现实处境。柯伦泰夫人的小说带有女性政治家的自传成分。她在婚姻和爱情上也一直实践着她的阶级观念和女权主张。她的人生阅历都在她的小说中有着或隐或显的叙述。

柯伦泰夫人的小说,情节模式化,叙述比较枯燥,人物性格单调,也缺乏丰富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内心的叙述,缺乏多变和复杂的故事以及丰满的叙述。她的小说,概念化倾向比较严重,其小说的故事大多是其共产主义主张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演绎,小说论辩性很强,观念性很强,理论的阐发胜过文学

^①李今:《柯伦泰和苏联的性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5月26日。

^②A. Kollontai, *A Great Love*, trans. by Lily Lore,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29, pp.158—159.

性的叙述；她的小说虽然常写到爱情，但是依然可以将其归入政治小说的范畴，俄罗斯革命的政治生活在她的作品里得到了很多的表现，她所使用的叙述话语也是政治性的。

柯伦泰夫人的理论主张和女权主义实践，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联，搅动起了一阵阵的风波。她既受到狂热的追捧，又受到恶毒的咒骂。国际女权主义者将她奉为先驱，她的著作和主张在欧美以及日本、中国都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二

当柯伦泰夫人的理论和创作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她的祖国开始消歇的时候，却引起了正处于革命中的中国文学界和妇女界的极大关注。

在1927年前后的中国大革命中，柯伦泰夫人的作品作为“革命文学”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在1927年的广州《民国日报》上，就曾出现有关革命的性爱道德的讨论，其中多有涉及柯伦泰夫人的观点和主张^①。柯伦泰夫人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系统翻译和出版，始于1928年。她的《三代人的爱》，最初在《新女性》上刊载（1928年9月）。稍后，《恋爱之路》，署名柯伦泰夫人著，由沈端先翻译，于1928年10月在作新书社出版。集中包括：“三代的恋爱”“姊妹”和“（附录）新恋爱道”。在《译者赘言》中，沈端先介绍了柯伦泰的生平事迹，以及在法国的影响。附录中的“新恋爱道”，林房雄作，由日本世界社出版，默之译。此节专门讨论了柯伦泰的“恋爱道”，介绍柯伦泰夫人的创作动机是“把大战后文明国所现出的两性关系的变化，来试作新的性的关系的心理的研究的”^②。杨骚从日文翻译了《赤恋》，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附原序、译者序。1929年，“学术研究会”温生民翻译《恋爱之道》，包括译序《三代之恋》《姊妹》，启智书局1935年再版；同年，温生民又翻译长篇小说《赤恋》，附有原序、译序等，启智书局1934年再版。^③到了1934年，过立先又重新编译了《赤恋》的节译本，由开华书店出版（国民政府查禁令误为中学生书局）。左联领导人周起应也翻译了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署名柯金泰著。1930年李兰也翻译了《伟大的恋爱》，并收入《伟大的恋爱》《姊妹》和《三代的恋爱》合编，署名柯伦泰女士著，由现代书局出版，1931年再版。^④

在1928年及其后所翻译的柯伦泰夫人的小说作品中，一般都附录有介绍其妇女革命主张的文章。而其政治和社会学整本著作的出版，主要有：署名“柯伦泰女士”的《恋爱与新道德》，收入“社会变革与两性关系”等文章，沈端先、汪馥泉译，北新书局1929年出版；1932年，方纪生翻译了《妇人与家族制度》，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收入“家族制度之变迁”“妇女劳动与家庭”等7篇文章；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沈兹九、罗琮合译《新妇女论》，由生活书店出版，195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再版，包括“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妇女问题的展望”等十四章。她的《工人反对派》，由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她的传记《苏联第一个女大使柯伦泰》，苏联埃明德林著，赫崇骥、胡汉英翻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苏联第一位女大使——亚·米·柯伦泰外交生活片段》，安·玛·伊特基娜著，王钊贤翻译，刊登于《世界博览》1986年第3期。还有讨论柯伦泰夫人的婚姻和性爱观念的文章，也很多，如李君毅《从爱伦凯到柯伦泰》（《妇女生活》第17卷第7号，1931年）等。

①熊权：《论时代思潮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

②林房雄：《新恋爱道》，柯伦泰夫人著：《恋爱之路》，沈端先译，上海：作新书社，1928年10月，第89页。

③又据《温健公年谱》（《山西文史资料》第69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版，第885页）：温健公（1908—1938）在1928年翻译了《赤恋》，署名是“张孝峰”，由启智书局出版。笔者没有查到温生民的生平，也没有查到温健公用“张孝峰”署名翻译的《赤恋》。当时“学术研究会”的三个梅州籍的作者分别是温健公、温盛光、温盛刚。据笔者推断，“温生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温健公的化名。

④李今：《柯伦泰和苏联的性文学》。

对柯伦泰夫人的介绍,还包括在那些介绍苏联妇女观念和女性革命家的著作中。如漫琴翻译的美国史密斯著的《苏俄的妇女问题》(启智书局,1929)、卢剑波翻译的《世界女革命家》(启智书局)以及温盛光翻译的《苏俄性生活真相乱婚裁判》(苏·德美朵委奇,启智书局),都大量介绍了柯伦泰夫人的人生阅历、社会理论和妇女思想。

柯伦泰夫人的著作和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曾经掀起了一个短时间的翻译热潮;但是,这些翻译很少是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周扬、夏衍、温生民、杨骚、李兰等人的译本也多由日文参考英文转译的,这可从他们把《瓦西里萨·马雷金娜》译为“赤恋”得到验证,因为“赤恋”——Red love,正是这篇小说的英文版的标题,而日本译本也都是参照英文版翻译为《赤恋》。同时发表的有关柯伦泰夫人小说的评论和围绕新恋爱问题的讨论,也加入了日本学者的意见。日本1927年11月世界社出版了松尾四郎翻译的《赤恋》,1928年4月世界社出版了林房雄翻译的《恋爱之道》(包括《三代之恋》《姊妹》)、1928年9月世界社出版了林房雄翻译的《恋爱与新道德》。1930年,中嶋幸子翻译《伟大的爱》(世界社),内山贤次、林房雄同时翻译了《姊妹》《三代之恋》,同年大竹博吉翻译了《妇女劳动革命》(内外社);1931年尾瀬敬止翻译了《母性与社会》,1936年大竹博吉翻译了《新妇人论》(内外社)。^①日本的柯伦泰夫人热,较之于中国稍早。中国的柯伦泰夫人的翻译也主要以日文译本为底本,并将日文译者的解读一本译入。

柯伦泰夫人的小说和女性观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在有着悠久儒家伦理文化传统的中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柯伦泰夫人的小说1928年9月中译本出版之前,其社会科学著作中文版1929年出版之前,可能是由于日本翻译的关系,其女性观和性爱观已经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第1章到第3章以《到M城去》的题名发表于1929年7月《红黑》杂志)就展现了关于讨论柯伦泰夫人《三代人的恋爱》的“性的完全解放”的场面。太太的客厅中的话题,对于男性来说,柯伦泰夫人引起了男性被打倒的忧虑,而对于女性则引起了她们关于性自由的妄想。特别是素裳针对夏克英说:“你还问做什么呢?你自己不是早就实行了么?也许你已经做过第四代的——所以柯伦泰的三代恋爱在你是不成问题了。”^②这样的话题一方面反映了柯伦泰夫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女性对于柯伦泰夫人的“误解”。

在军阀徐大齐的富丽堂皇的西式客厅中,女眷们公开讨论着柯伦泰夫人的小说《三代人的恋爱》。在两个女眷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年都市妇女,最感兴趣的,不是柯伦泰夫人所论述的“革命”,而是她的小说中所展现的放纵的性爱,这种性爱哪怕是超越伦理的,她们依然可以在客厅这种公共场合讨论。这种性爱放纵,所追求的是对于妇女身体的绝对权力,它是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妇女解放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新女性》杂志专门组织了对于“新恋爱问题”、“性爱道德”等的讨论。该刊第36号(1928年第12卷第13期)的“新恋爱问题”特辑,同时发表了16篇文章,主要有(卢)剑波的《论性爱与其将来的转变》、姚方仁(篷子)的《关于三代的恋爱的分析观察》、(倪)文宙的《读了〈三代人的恋爱〉〈新恋爱道〉〈非官僚的恋爱观〉》、朱梅的《恋爱的现在与将来》、章克标的《读〈三代之恋〉后的感想》、洪钧的《“自由性交”与“恋爱游戏”》、静远的《恋爱至上感的抹杀》、安之的《用相对性原理——应新女性九月号里所征求的关于新恋爱问题的解答》、(孙)伏园《我们将有自己的三代的恋爱》、孙福熙的《三代之恋的二人谈话》、陈醉云的《个性本位的恋爱》、毛尹若(毛一波)的《读新恋爱道后》、弋

^①秋山洋子:《柯伦泰恋爱论与中国的介绍》,《骏河台大学论丛》(第40号),2010年,第71—90页。

^②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胡也频、鲁彦散文小说选》,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502—503页。

灵的《新恋爱问题》、波弟的《读三代的恋爱后》、龙实秀的《新恋爱问题的我见》、蒲察的《对于新恋爱问题的解答》以及日本学者山川菊荣等的文章,集中介绍和讨论了《三代人之爱》的恋爱问题和性爱问题。

沈端先在《恋爱之路》的“附录”中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柯伦泰夫人的误解,进行了辩白。他借日文译者林房雄的文章认为,柯伦泰夫人在《三代的恋爱》中所想指示的并不是“过渡期的淫荡”,“实是有着新生活,新感情,新概念的阶级中的新道德”^①。夏衍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些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他强调,柯伦泰所描写的“只是革命过程中间的少数前卫分子适合于当时客观条件而遂行着的非常态的性的行动,而决不是表明着新兴普洛塔利亚阶级对于性爱问题的理想”,是特殊的、一时性的“过渡性的事实”,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倾向,并用列宁对于性爱问题的观点批驳了这种杯水主义的行为和理论。^②温生民也在他翻译的《赤恋》译序中说:“恋爱不过是有闲的老爷,太太,小姐们制造出来的神秘的名辞,我们是被压迫者,哪有机会、时间和精力去恋爱”,“我们还有比‘恋爱’更重大的任务啊!”“我们要享受美满的‘恋爱’,我们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变革社会的工作—才可能。”“赤恋便是暗示这种‘恋爱之道’的有意义的小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本书的一切主张,可是,华茜丽莎从两性关系的囚笼超脱出来,勇敢地对着现实做一位社会人这一点却是值得赞赏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把它翻成中文,并不是为了本书已有十余国译本的虚誉才动手译的。”^③中国左翼文学界一方面借着为柯伦泰夫人辩白而为苏联辩白,另一方面借着杯水主义对抗着中国传统的女德观念,而为女性主义张目,张扬革命文学的诱惑力。柯伦泰的翻译主要是左联作家和理论家,而“中国当年对她的热情接受主要出于对苏联及其社会生活的向往和模仿”^④。

其实,有关柯伦泰的讨论,只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关于妇女问题和健康性爱问题讨论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张竞生的性学,以及日本的片冈甲兵的《色情文化》都曾引起热烈而集中的讨论。只不过,有关柯伦泰的讨论,与苏俄文化和当时中国敏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关而已。

三

柯伦泰夫人的新道德理论和小说创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左翼革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将柯伦泰夫人的性爱道德、同志式爱情,以及“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与中国革命语境相结合,并根据柯伦泰夫人的小说《赤恋》,创作并命名了中国左翼文学的“革命的罗曼蒂克”^⑤叙述。

柯伦泰夫人的“一杯水主义”恋爱观念,促成了早期左翼“革命罗曼蒂克”叙事中具有开放的性爱观念的、热情的“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矛盾的《蚀》三部曲的革命加恋爱模式以及女性主人公的性观念受到柯伦泰夫人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在《幻灭》中,静女士眼中的武汉的国民政府机关的革命和恋爱,非常类似于《伟大的爱》所描述的情形。在革命机关中“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于是,“要恋爱”就成了机关里的人们的“流行病”。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女性革命者们“疯狂地寻觅肉的享乐”,

①林房雄:《新〈恋爱道〉》,柯伦泰夫人:《恋爱之路》,默之译,上海:作新书社,1929年,第89页。

②沈端先:《〈恋爱之路〉〈华茜丽莎〉及其他——所谓“苏联性文学”问题》,《文艺讲座》(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

③柯伦泰:《赤恋·序》,温生民译,上海:上海启智书店,1934年,第1—2页。

④陈方:《柯伦泰的女权主义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⑤瞿秋白:《革命的罗曼蒂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

“新奇的性欲的刺激”。^①她们与异性的交往,放纵本能,在不同的异性之间寻求性爱的满足,完全没有传统的家庭和爱情观念,“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有时我也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并且以身体的需要为名,寻找到新的伦理支撑——“我们正在青春,需要各种的刺激,可不是么?刺激对于我们是神圣的,道德的,合理的!”(《追求》)显然,《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们都是比较典型的热尼娅式的杯水主义者。柯伦泰夫人的《三代人的爱》所提供的热尼娅式的两性关系模式,在丁玲的小说《韦护》中体现得更为典型。主人公韦护留学俄国,在那里,他遭遇了柯伦泰夫人式的爱情。他与俄国女子依利亚^②相爱,但她同时又与一个波兰人搞在一起。“依利亚是一个奇怪的女子,办起事来,一点不马虎。她同许多人好过,但不久就都把他们丢了。她同韦护决裂的时候,她大声地嚷,她几乎打他了。”^③其实,丽嘉在坠入韦护的情网之前的故事,就是依利亚故事的中国版。丽嘉与众多男子恋爱,既保持着同浮生之间的关系,又保持着与柯君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好几个男人之间,恋爱很随便,丽嘉也近乎是一个杯水主义者。《韦护》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瞿秋白,而韦护在俄国的恋爱故事,很可能来自于瞿秋白对于柯伦泰夫人的转述。丁玲的演绎虽然具有柯伦泰夫人式的反家庭倾向,但是,她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却在两性交往追求性的满足的同时也追求爱情。

柯伦泰夫人小说所描述的具有开放的性爱观念的人,大多是女性。但在中国左翼文学叙述中,这样的性观念也被移植到男性主人公的身上,可以说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性观念也促成了左翼革命罗曼蒂克叙事中“新男性”形象的塑造。

洪灵菲的小说《流亡》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沈之菲流亡之中的恋爱。他说:“人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吃饭,所以需要革命!”^④沈之菲就如同孔子一样,将“食色”看作是基本的人性。在这位革命者的眼中,性爱和吃饭都是自然的需要,假如不能满足,就要反抗。于是,男主人公就在流亡的过程中,与异性发生着近乎随意的性爱关系。柯伦泰夫人的爱情模式,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家庭体制倾向。她反对将爱情纳入婚姻体制,将爱情纳入社会体制,主张女性可以自由获得性爱的满足。而洪灵菲的小说也将这种对婚姻制度的反抗,与革命对社会制度的反抗,等同了起来,并将这种以革命之名性爱观念,赋予了男性革命者。柔石的长篇小说《三姐妹》,更是可以看作是一部反《三代人的爱》模式的叙述。在《三姐妹》中,男性主人公章先生次第地与莲姑等三个姐妹恋爱,并没有什么伦理的限制。这部小说,看上去,就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姐妹情结”,但是,当我们将它放到柔石的革命文学家的身份背景上去考察的时候,这个三姊妹情结,则显然来自于柯伦泰夫人。假如说《三代人的爱》张扬的是女性的权利的话,而这部《三姊妹》则张扬的是男权,张扬的是男性的妻妾成群的性幻想。杯水主义既然为柯伦泰夫人所发明,所以它一般指向女性的性道德,也是女权主义的,但是,它一旦用来叙述男性的情感故事就会变味,就会落入中国文化的父权制陷阱,成为一种反女权主义叙事。当柔石笔下的姐妹一个个都被动地等待着革命者男性对自己施爱的时候,男主人公也就变成了贾宝玉。

柯伦泰夫人的性道德的杯水主义,虽然具有冲击和超越现实伦理道德规范的倾向,但却具有特别的人性深度。她并不因革命理论和革命工作而无视人性的本能,她也使得革命的女性工作者具有正常的人性。这种对于女性人性本能的关爱,在中国早期左翼文学中,不管是男性创作还是女性创作中,都得到彰显。即使到了当代,在舒婷的诗作《神女峰》中依然可以看到她的影响。

①茅盾:《蚀》,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第80—160页。

②依利亚,就是《三代人的爱》的女主人公热妮娅的另一种音译。

③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④洪灵菲:《流亡》,《洪灵菲选集》,上海:开明书店,1952年,第44页。

在柯伦泰夫人小说中经常所讲述的同志式爱情中,女性同志之所以选择“杯水主义”爱情,原因主要在于她们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柯伦泰笔下的女性“在爱情与事业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事业”的叙述模式,促成了中国左翼罗曼蒂克叙事中意志坚强的强势女性形象的塑造。

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工人罢工行动的主要领导者克佐甫、苏伦、蔡真、玛金等共产党人之间有着混乱情爱关系:蔡真在紧张的会议中,一会儿依偎在同性的革命者玛金的身上,一会儿又贴到革命者陈月娥的身上,从同性革命同志那里寻求身体安慰;而苏伦在向玛金倾诉了女友背离之后,就在会议的间隙企图与玛金发生关系,他认为“性的要求和革命的要求,同时紧张”^①。但是,只有女性革命者玛金能够勇敢摆脱自身的脆弱和克佐甫的纠缠,义无反顾意志坚强地投入革命工作。玛金这一坚定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赤恋》中的女革命家瓦西里萨·马雷金娜。虽然“男女之爱是人生追求中最大的动力,其力量往往是超越理智和现实环境的,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不能用一般的政治逻辑和思想逻辑来解释”^②,但是,革命新女性的身上还是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坚强的意志力,相对于男性的空洞、脆弱,她们的形象更刚性,更符合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五四”文学中的女性,所争取的是女性自由婚姻的权利,她们往往将性纳入爱情和个性解放之中去考量,而柯伦泰主义之下的左翼新女性,她们更多考量的是女性的社会责任。所以,出于对于女性评价标准应从家庭的义务转移到社会的义务的一贯主张,她特别强调不要从“家庭道德”来否定她的人物,而要从她们对于自己的阶级、国家和人类全体的贡献来“奉献着充分的尊敬”^③。柯伦泰认为,“尊敬一个妇女,判断她的价值,不是从她的家庭美德出发,而要从她的贡献,她的才能,她的工作对阶级、国家和整个人类的意义来判断”^④,“爱情仅只是一个阶段,生活道路上的一次休憩,她的实在的生活目标是党,是理念,是煽动和宣传工作”^⑤,“首先是工作,然后才是恋爱”^⑥。

柯伦泰夫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在爱情与事业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事业”的叙述模式,在中国左翼作家的笔下被放大到了男性人物的身上。夏衍是柯伦泰小说的翻译者,他的话剧《上海屋檐下》中,当革命者匡复陷入爱情的漩涡的时候,毅然决然放弃了爱情,而投身于革命之中。这部剧作突出了“比爱情更重要的是革命”的主题。其中匡复陷入爱情漩涡以及出走的情节,非常类似于柯伦泰的《赤恋》马雷金娜的出走和回到革命岗位的情节。丁玲在小说《夜》中,讲述了村主任何华明与妇女主任侯桂英的爱情。当夜晚到来,何华明与侯桂英都感情澎湃的时候,何华明突然想到了自己作为村干部的责任,于是,他与她遽然终止了他们的爱情。将革命工作看得比自己的恋爱更重要,甚至用革命工作压制自己的情感。这是柯伦泰式的爱情,但也不是,因为在柯伦泰的语境下,恋爱可以进行,但是绝不可以影响革命工作。在中国的语境下,柯伦泰夫人的哲学被儒家的理学精神所篡改。这种理智对情感的抑制在《创业史》中再次出现,当梁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的时候,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的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任感情的弱点”,“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⑦在当代语境下,柯伦泰夫人的“工作第一”甚至演变成了“工作唯一”。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全部在叙述中驱逐了恋爱、婚姻和家庭。

在柯伦泰夫人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性格强势,且处于叙述的中心,而男人主人公则往往沦为

①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②张福贵:《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中日“无产阶级小说”的形象关联和思想关联》,《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柯伦泰:《赤恋·序》,杨骚译,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5页。

④A. Kollontai,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Red Love*, trans. by Sally Ryan, New York: Seven Arts Publishing Co, 1927, p.7.

⑤A. Kollontai, “*New Woman*” from *The New Morality and the Working Class*, trans. by Salvator Attansio, Herder and Herder, 1971, p.6.

⑥A. Kollontai, *Love of Worker Bees*, Trans. by Cathy Porter, London: VIRAGO, 1977, p.29.

⑦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463—464页。

配角,并且性格柔弱,是被同情和呵护的对象。《赤恋》中的女主人公瓦西里萨·马雷金娜、《伟大的爱》中的娜塔莎、《三代人的爱》中的三位女主角玛利亚、奥尔加、热妮娅,都是政治生活中和私人感情中的女强人。“她们在意志和道德方面却总是高于男性的”,女主人公大都性格坚强、处事果断、信念坚定、大公无私,满怀工作热情,有“大丈夫”气质;而男主人公却往往是“契诃夫式的人物”,处事犹豫,缩手缩脚,斤斤计较,在爱情上也多见异思迁,“面对所爱的男性,女主人公们往往表现出某种‘母性’,带有近乎怜惜的关怀,对于同性,她们则总能体现出‘姐妹情谊’”。^①这种强势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左翼女性作家的创作影响是明显的。丁玲的带有自传性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自始至终以莎菲作为叙事的中心,而且,她把玩两个男性。她认为,她的追求者凌吉士所追求的女性,就是客厅中有个白白胖胖的太太和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这种给予女性的传统家庭妇女的定位,让莎菲非常的不满和厌恶。莎菲的厌恶,可以从柯伦泰夫人的《妇女与性道德》中得到很好的注解。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当作男人的财产。她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婚姻,二是卖淫。前者充满虚伪,后者则是毫无遮掩的买卖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②莎菲女士,显然也是反家庭的,她只在两个追求者中获得男性的献媚,甚至性的满足,而并不追求家庭的建立。

柯伦泰夫人的强势女性形象,在现当代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也有着充分的表现。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有着很高政治觉悟的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也是把工作看得比家庭、子女更重要。当一个工作队员问邓秀梅为何不跟爱人一起下乡时,她答道:“他走那条路,跟我什么相干?”“我为什么要跟他,他为什么不跟我?……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你们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响,来服侍你们。”她还想到,“跟普通妇女们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像自己,也有点像另外的一方。但不是现在,现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了孩子会碍手碍脚,耽误工夫。”^③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也展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强势女性形象。小说的男主人公丈夫希望,是一个好吃懒做,且有大男子主义气质的男人,而李双双却非常的精明能干。而希望正是在妻子李双双的调教之下,才从一个懒汉变成了工作的人。在样板戏《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杜鹃山》《沙家浜》以及《洪湖赤卫队》中,都是女性革命家作为叙述的中心人物,所有的剧作也都基本上是展现女性革命家强悍的政治智慧。如同柯伦泰的小说一样,这些剧作中的男性主人公大多鲁莽、懦弱,即使是正面人物也多是刻板,没有个性,就是有权力的反面人物,也都完全是女性人物的陪衬,听从女性人物的调遣或玩弄。

柯伦泰夫人的小说大多讲述的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同志爱情”。《赤恋》中的马雷金娜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同志爱情是理想的爱。”^④同志式的爱情叙述在中国左翼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完美的搬用,在中国现当代左翼罗曼蒂克叙述中,所有的爱情叙述都无一例外地属于同志式的爱情,假如出现非同志式的爱情的话,那一定是反叛的,也一定是非法的,并且一定会在叙述中被中断,或者是作为真正的爱情的反面铺垫。胡也频的小说《光明在前》就是通过刘希坚在无政府主义女人和共产主义女人白华之间的选择,张扬了志同道合的爱情。这种同志式的爱情在延安以后的革命文学中非常的普遍。在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通过林道静的选择,即放弃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余永泽的婚姻而选择与革命者卢嘉川的爱情,将爱情由个人的爱情转向阶级的同志的爱情。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讲述了团支部书记焦淑红不顾年龄的悬殊,爱上了已婚且有孩子的党支部书记肖长春。作者以

①陈方:《柯伦泰的女权主义小说》。

②转引自程映虹:《柯伦泰:从斗士到花瓶》,《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③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④转引自陈曦:《红色文学中的享虐叙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旁观的立场说明：“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因为“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①这种同志式的爱情甚至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改革小说《鸡窝洼人家》中。该小说中的两对男女是依照志同道合来重新组合的，喜欢过传统日子的（保守的）男人和女人，喜欢赚钱过好日子的（先进的）男人和女人，各自离婚再结婚，而各得其所。传统的“姐妹易嫁”和地摊文学中的“换妻”故事，被重新阐释和包装为“志同道合”的时代姻缘。就是在舒婷的诗作《致橡树》中也依然可以隐约窥见其身影。

中国红色罗曼蒂克叙述的上述种种表达方式，实际上是我们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的结果，而假如我们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现代红色罗曼蒂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接受和表达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中，“杯水主义”汪洋恣肆；而到了延安时期，“杯水主义”受到了显在的抑制，纯粹的柏拉图式的“同志爱情”逐渐上升为主导；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具有明显的禁欲特征的女性权力叙事，则成为绝对的主流。

柯伦泰夫人的新道德理论和革命加恋爱叙述，对中国现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受中国革命具体语境的影响，受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左翼红色罗曼蒂克”叙述，在想象方式和价值倾向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异和创新。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Translation of Mrs. Kollontai's Novels and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of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FANG Weibao

Abstract: The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of Mrs. Kollontai, a female revolutionist in the Russian and Soviet Era,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er novels, set off a great wave of translation and reading in China in the post-May 4th era. The "new morality" advocated in her theory and creations promote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beginning in modern times to its climax. The narrative mode of "revolution plus love" constructed by Mrs. Kollontai in her theory and novel writings initiated the creation of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in Chinese modern left-wing literature. However, the modern Chinese left-wing romantic creation was not a simple copy of Mrs. Kollontai's works. In the process of conceiving stories and presenting values, it was naturally influenced by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al ethical culture: due to its own innovations, Chinese left-wing romantic literary creation is more complex and more colorful than that of Mrs. Kollontai.

Key words: Mrs. Kollontai; translation;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variation

About the authors: FANG Weibao,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①浩然：《艳阳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470—471页。